

兩個百年之間的中國

連動的內外困境

China and its Two Centenary Goal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External Dilemma and Internal Perplexity

游智偉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

壹、前言

中國共產黨即將於今（2021）年邁入建黨百年，而下一個里程碑則是 2049 年的建政百年，但在 2021 到 2049 年之間，中共即將面臨的內外挑戰將遠大於過去的挑戰。在中國大陸內部，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與總書記任期制一事終將進一步強化中共政治菁英之間的矛盾，隨著政治矛盾的增加，維持高速經濟發展與強化意識形態控制的必要性將隨之上昇，因而中共對外政策將日益強硬。

而在國際社會，隨著各國日益疑慮中共嘗試改變現狀與國際秩序、以及中國大陸因經濟發展而增加攫取資源與技術，各國對中共的政策也正轉向；而中共政治情勢即將到來的僵局與其影響一日益強硬的對外政策，則將持續惡化各國對中共的態度，因而使得中共在雙百之間面臨的挑戰將日益艱難。

貳、兩個百年之間：中國大陸的可能發展

一、廢除任期制將導致中共政治穩定陷入兩難

習近平於 2018 年正式廢除中共國家主席與總書記任期制，短期內雖有助於集中權力因應中共自改革開放後累積的問題，例如貪腐、貧富差距與經濟轉型等挑戰，但長遠將導致政治菁英的競爭與分裂，而若習近平的身體狀況不佳，這樣的情況可能更被惡化。

習近平年紀的增加或政績的不足可能使中共政治菁英的競爭逐漸浮上台面。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一事與中共對社會控制能力與技術的提升原已使中共政治菁英的互動暗潮洶湧。即便在不考慮習近平身體狀況的情境下，隨著習近平年紀的增加，中共政治菁英之間的互動也將日益激烈，因為年紀增加伴隨精力下降與分享權力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在即將到來的第三任期，若習近平無法取得超越前人的政績，其面臨挑戰的嚴峻程度將逐漸提升，但若習近平希望滿足前者，則將進一步惡化中共在國際社會的處境，因為這類議題往往是國際社會關切的議題，例如臺海。

另一種假定情境—習近平的健康突然惡化—則將帶來更明確的挑戰與困難。若習近平的健康突然惡化，中共政治菁英對權力的爭奪將更為明顯，甚至造成政策路線的歧異。在這種情境下，中共政治菁英之間的合作與鬥爭將逐漸浮上台面，若渠等原有關係較和緩，則可能呈現另一種政策競逐，檢視何者提出的政策或政績得以超越前人，同時在各別派系合縱連橫的條件下，展開新一輪的政治鬥爭。而若渠等原有關係較為對立，則渠等原有的歧異—不論是政策路線、利益或意識形態—將因習近平健康的突然惡化而被凸顯，

而政策路線的歧異將第一個被凸顯，其次可能發生的現象則是菁英分裂，進而造成中國大陸及其周邊地區的衝突。

二、高速經濟成長與政治穩定的關連性

即便不考慮習近平健康狀況，中共正面臨的難題之一為：如何在經濟轉型的過程維持高速經濟成長。改革開放後，高速的經濟成長一直是中共賴以維持統治的基礎之一，即便習近平上台後逐漸提升以民族主義或意識形態作為統治基礎，但高速的經濟成長始終是中共很重要的政績表現。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將導致穩定社會成本的增加與政治動盪的可能性。近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逐漸陷入瓶頸，因為人口紅利逐漸被消耗殆盡，且高科技企業的發展也因基礎科學與科技的研發不足而陷入困境；同時，過去中共強迫歐美企業技術轉移的政策與市場准入政策近年也屢受歐美國家詬病，這些均可能導致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速度趨緩。而當經濟成長速度趨緩之際，失業率也將隨之上升、維護社會穩定的成本將隨之增加，中共原有的央地問題也可能因資訊不對稱與委託（中央）及代理（地方）兩者目標的差異而被凸顯，進而造成中共政局的不穩定。

三、政治穩定與對外政策的關連性

另一方面，民族主義一直是中共偏好的意識形態之一，這個現象在改革開放後更為明顯，習近平上台後提出的政策口號更充斥著民族主義，例如 2012 年提出的「中國夢」與今年政協會議提出的「中國已可平視世界」。然而，過度以民族主義為統治基礎，導致政策陷入僵局或導致衝突的可能性反而越高。

從縱貫面的長時期變化檢視，從 1980 年代以來迄今為止，民族主義與各別因素的混合在不同時期下均影響了中共外交政策。即便是在更加強調經濟發展的胡錦濤與溫家寶時期，解放軍仍能透過操弄民族主義與其職權以展現渠等對胡溫的不滿，例如在胡錦濤接待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之際試飛新型戰機。而若檢視橫貫面的習近平時期，這個現象更嚴重。戰狼外交是最明顯的案例之一，自 1980 年代以來，中共外交官員—特別是曾有駐外經驗者—對歐美國家及國際社會的理解甚深，也相當清楚中共與歐美國家的差異，因而相當程度地扮演橋樑連接兩者，例如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楊潔篪擔任駐美大使期間，美國政界對其評價正面，中共外交官員於楊潔篪出任外長之際也公認其為「嚴謹、細緻、謙和、得體的『儒帥』」，但在近年美「中」的安克拉治對話中，楊潔篪在公開場合表現的態度便極具攻擊性。這樣的變化也許緣於不同職務，但更重要的卻是大環境的差異，因為 2001 年軍機擦撞之際，中共未有任何政治局委員對此發表意見。

習近平於上任初便提出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國夢」口號，而中共政治與官僚菁英的言論帶有的民族主義色彩也隨之提升，但從過去古巴或前蘇聯的案例來看，這類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言論最終將制約對外政策選擇，更傾向採取激進而強硬的選項。實際上，近年中共對外政策已浮現這樣的特徵，不論是近年處理周邊領土主權爭議的政策，不論是在印「中」邊界或東亞海域。日益強硬的對外政策也將惡化中共與他國雙邊關係，並帶給中共外交政策更大的負擔。

參、強硬而擴張的對外政策

即便習近平廢除任期制一事對強化中共的統治能力與解決既有問題而言有其必要性，但強硬的對外政策—包括傳統意義上的外交政策與對外經貿政策—卻為必要配套。因為在維持高速經濟成長的困難日益提升下，中共倚賴意識形態與社會控制以維持政治穩定的必要性也隨之提升，而這些因素也影響在中共針對海外市場、資源、技術及專利的全球投資、以及隨之增加的海外軍事行動。

一、國家資本主義主導全球併購：干預市場規則與引發他國警覺

最晚於 2005 年，中國的企業曾嘗試透過併購取得歐美企業的技術或專利權，但許多努力最終因政治因素而失敗。早年的經典案例為 2005 年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UNOCAL）一案，該案被美國國會否決。而在該次併購失敗後，中國能源國企更多地轉向併購中小型的歐美企業，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其他領域，以 2016 年為例，中國於該年上半年收購了 24 間德國企業，多數集中在科技產業。無論是過去大規模的併購模式或近年小步快走的模式，均反應著中國對技術與專利的渴求，同時也反應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在可見的未來中，這樣的現象也將持續存在。

然而，這樣的操作模式卻將引起各國政府的警覺，因為即便許多近年負責併購的企業表面上並非國有企業，但渠等併購的企業多屬高科技產業或該企業擁有資產具有高度戰略價值、且若仔細檢查這些大陸企業的背景—包括成立過程與董事會成員經歷，渠等與中共政府的關係往往千絲萬縷，而這也是近年歐美國家極力拒絕大陸企業併購的原因之一。

而近年中共又有更新的操作模式，即便尚未引起各國警覺，但

卻已打亂國際市場的運作與為日後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埋下隱憂。長年高速的經濟發展使得中國大陸累積相當詞，近年渠等致力擴大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市場，創投市場的規模已僅次於美國，同時也更精準地鎖定某些具有戰略價值的產品或技術，以 2019 年為例，中國創投市場投入最多資金的產業依序為半導體（8.5%）、醫藥（8.1%）與傳統製造業（8.1%），而中國創投市場針對的產業目標與大陸企業海外併購的產業類別相似，反將更進一步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憂慮。

二、海外投資與海外軍事行動的增加

另一方面，大約於 1990 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向外尋求資源的壓力開始增加，因而在胡錦濤執政初期提出「走出去」的政策，最終習近平時期提出「帶路倡議」，此一過程雖反應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成果與動力，但投射在外交政策上卻反而造成日益強硬的對外政策與日益增加的海外軍事行動。

在強硬的對外政策上，習近平重要的外交政策：《帶路倡議》的提出與亞投行的設立卻可能將給中共帶來相當大的困難。就前者來說，即便科技的進步賦予人類改變地形地貌的能力，但始終附帶鉅額成本，而觀察歐亞大陸的地形與氣候，《帶路倡議》帶來的不僅是基礎建設，可能還有巨額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亞投行的設立已使國際社會警覺中共嘗試建立新的國際組織，但國際組織的建立有賴於國際社會對領導國家的正面評價—而這卻是中共外交政策長年的軟肋。

在海外軍事行動上，大約在 1990 年代到 2010 年的 20 年中，中國大陸企業在海外的投資遭遇不少困難與風險，以石油與天然氣的

投資為例，中國能源企業的海外投資及佈局受制於歐美石油企業既有投資的箝制，僅能投資政治局勢較動盪或安全風險較高的產油國，例如安哥拉與蘇丹，這也導致能源國企的鉅額損失。然而，這些投資損失也造就了保護這些海外投資資產的必要性，迫使解放軍必須增加在海外的軍事行動或尋求建立投射基地，例如參與部署在非洲之維和任務、在吉布地建立軍事基地等。

肆、結論

綜言之，從 2021 年到 2049 年，中共可能將因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與日益強硬的對外政策而陷入兩難。在中國大陸，在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但卻未明確政治繼承制度的條件下，中共政治菁英之間的互動可能將因習近平年紀的增長、健康狀況的突發問題或政績未如預期而轉趨惡劣。而中共若欲維持政治穩定，對外政策的強硬與主動便有其必要性，不僅為了滿足民族主義的期待，更重要的是透過更強硬而主動的對外政策，獵取更多的市場、資源與技術以維持經濟轉型過程中的高速成長。

然而，這樣的對外政策卻可能將進一步惡化近年原已逐漸陷入困境的國際處境，美國前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開啟的美「中」貿易戰尚未停歇或降溫，而近來美國現任總統拜登（Joe Biden）與其國務院成員奔走各國重整民主同盟，並逐步將中共在意的議題—例如臺灣海峽—列入聲明。這些事件暗示著美「中」關係短期內轉佳的可能性不高，且美國的傳統盟邦在陣營與價值的選擇上也較偏向華盛頓。而面對這樣的現象，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戰狼風格持續，反將持續惡化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印象，並使中共的對外政策更被民族主義制約，進一步陷入本文前述的惡性循環。

